



跨越階級界限？：
兼論「黑手變頭家」的實證研究結果及
與歐美社會之一些比較

許嘉猷* 黃毅志**

致謝：

作者感謝助理柯慧雯、賴威岑幫忙整理資料、打字與校對。此外，並謝謝二位匿名審查人之審查意見。所有文責，當然由作者承擔。

* 許嘉猷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 黃毅志 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

收稿日期 2001/2/19 · 接受刊登 2002/2/22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新馬克思主義者 Wright 的多元剝削探討取向之階級分類探討臺灣階級流動，並與一些西方社會作比較。我們先對臺灣的基本階級位置加以分類，並進一步以對數線性模型進行代間、代內流動表分析，藉以探討階級可滲性問題。

在實證層次上，本研究運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計畫於一九九二年蒐集的全國性樣本調查資料以進行流動表之分析。研究發現顯示：

- (1) 就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代間流動過程而言，在三個面向的流動中，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或流動機會最低，有產權（擁有生產工具）與沒產權者間的可滲性居中，有權威與沒權威者間的可滲性最高。
- (2) 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的代間流動中，仍以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最低，有產權與沒產權者間之可滲性最高，而有權威與沒權威者間之可滲性居次。
- (3) 子代初階到現階的代內流動中，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特別低，有產權與沒產權者間之可滲性居次，有權威與沒權威者間之可滲性仍最高。
- (4) 在階級流動存有結構障礙之前提下，部份勞工仍有去普羅化的代內職業生涯流動，其過程呈現出「黑手變頭家」的頭家化（尤其是小頭家化）和經理化現象，而無專業化現象。

關鍵詞：階級流動、階級界限、階級可滲性、階級多元剝削取向、黑手變頭家

一、前言

自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在社會階層的研究方面，開始了地位取得研究的熱潮，並且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因此對於個人階層化的因果機制，有越來越深入的理解（許嘉猷 1982；瞿海源 1982；蔡淑鈴、瞿海源 1992；謝小苓 1992；黃毅志 1993；Tsai, Gates, and Chiu 1994；薛承泰 1994；章英華等 1996；孫清山、黃毅志 1996；Lin 1997；蔡瑞明、林大森 2000）。相對而言，以階級為分析單位，分析各階級間的流動，親密的社會互動，如婚姻、友誼網絡之結構，以及流動、互動所涉及的階級界限之可滲性（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與階級形成問題，雖然在階層化理論上也很重要（Western and Wright 1994; Wright and Cho 1992），然而，臺灣在這方面的研究卻還不是做得很多，仍有很大的研究發展空間（許嘉猷 1998）。

相對於多數的社會流動研究集中於地位取得研究，少數探討也是很重要的「階級流動結構」之研究，就顯得較為與眾不同（謝雨生、余淑娟 1990；許嘉猷 1990a；孫清山、黃毅志 1997；熊瑞梅、黃毅志 1992；Tsay 1997；吳乃德 1997），但仍累積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不過這些研究的樣本往往還不是很大，所能分析的樣本也不是有全國代表性之隨機樣本，此外，往往又受到運用既有調查資料的限制，在變項測量上不是很周全（謝雨生、余淑娟 1990；許嘉猷 1990a）。而各個研究所採用的階級概念與階級分類，又有相當程度的分歧，這除了因為有些樣本還不夠大，祇能採用粗略的分類，如四分類（熊瑞梅、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7）之外，目前尚未建立一項大家都可接受的階級分類也是原因。本研究則延續先前臺灣的階級研究（許嘉猷 2000），採用新馬克思主義者 Wright（1985, 1990）的多元剝削探討取向

之新的階級分類，分析階級流動，並進一步以對數線性模型進行代間、代內流動表分析，藉以探討階級流動結構所涉及的多元階級之可滲性問題，同時並檢視「黑手變頭家」（工人變老闆）的實證結果及其意義，以及與歐美社會在階級可滲性方面之一些比較。

二、文獻檢討

近代社會學者對階級結構的研究，可分為二大主流。一是以闡述和補充馬克思的階級概念為主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的階級概念所強調的是居於不同生產位置者彼此間的剝削關係；另一主流是基於韋伯的階級概念，根據強調不同生產工作者的生活機會是否有所不同，而給工作者的階級做分類，並進行階級流動等經驗研究（許嘉猷 2000）。然而接受待遇不平等、生活機會不同的工作者，彼此間並不見得就會形成敵對衝突；而彼此間具有剝削關係的不同生產位置者，就比較有可能會形成敵對衝突，並導致進一步的社會變遷（Western and Wright 1994）。本文則以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階級結構的看法為基本出發點，以探討臺灣地區的階級流動結構。

（一）馬克思階級理論之簡述

馬克思把基於生產工具私有權的階級區分，視為階層化的最主要面向，因而他專注於階級分析。依照馬克思的觀點，階級關係與生產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發展下，小規模生產方式日益無法與資本家的大規模生產方式競爭，使得小規模生產者，即「小資產階級」，逐漸成為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產物，隨著資本主義之擴張與發展，小資產階級就會日漸淘汰。故小資產階級並不構成

馬克思之理論重心。就馬克思而言，生產關係將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資產階級與工人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具有生產工具私有權，並藉此來控制工人的勞力，剝削工人，並累積財富；而工人則一無所有，受盡苦難（Elster 1986）。

在苦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馬克思認為：唯有工人發展出階級意識而起來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方能解除階級不平等的苦難；他並指出工人要從佔有客觀階級位置的自在階級，發展成具有主觀階級意識，而能起來行動的自為階級。在此階級形成的過程中，「階級不流動」是很重要的先決條件（Goldthorpe et al. 1980:5；王振寰 1989；黃毅志 1999）。否則，透過階級流動，統治的資產階級可以把出身於工人階級中最優異人才納入統治階級，而有著穩固、反革命的效果。故階級流動有礙階級行動（Goldthorpe et al. 1980:5）。換言之，假如某一社會的社會流動速度與型態妨礙階級核心分子的形成，則階級意識和行動的發展，也將受到妨礙與限制。例如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58:444）即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工人，常常能夠轉變成為獨立自主的、相當富裕的農民，因此，其工人身分，常祇是短暫的、變動不居的，不久之後，他們就轉變成為其他階級了。結果固然促進了社會流動之比率和速度，但同時也由於沒有穩定與長久的核心人口而妨礙了十九世紀美國工人階級意識與行動的發展。馬克思並進一步預言：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小資產階級會日漸淘汰，無產的工人向上流動成小資產及資產階級的機會變得微乎其微，有助於工人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之發展（Goldthorpe et al. 1980:4-9）。

（二）新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發展與階級流動之研究

隨著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結構日趨複雜，除了小資

產階級仍然繼續生存，不符合馬克思的預測之外，又有經理及專門技術人員之興起，使得社會分化日趨複雜，馬克思以「是否擁有生產工具」，來劃分資本家與工人兩大階級的單面向階層觀，已顯得過份狹隘（Wright 1985, 1990, 1999）。當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在探討階級結構時，如何處理所謂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之問題，已成為一個非常關鍵的理論議題（Wright 1976, 1980, 1985）。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的抽象層次而論，階級結構祇包括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兩大階級。不過，如果要用此兩極化的階級概念去具體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時，就立即面臨二個重要問題：此一社會的生產模式是否祇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為主？以及如何處理一些新興的社會類別，例如專業技術人員、經理等等？這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之定位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古典馬派理論認為簡單商品生產（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乃屬於前資本主義（pre-capitalist）生產模式的一種形式，此生產模式與代表它的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之命運，注定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資本的集中化與生產規格化而漸被淹沒。然而，上述看法，最近不論在國內外理論或實證方面，都遭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與挑戰（Bechhofer and Elliott 1985; Portes and Sassen-Koob 1987; Steinmetz and Wright 1989；謝國雄 1989a；許嘉猷 1990b；柯志明 1993）。這些學者們認為簡單商品生產與小資產階級，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競爭壓力之下，常能表現出高度的韌性和適應力，因此使它能够持續地融合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之下，而不至於消失或沒落，甚至於有復甦與再興的傾向（參閱許嘉猷 1990b；Bechhofer and Elliott 1985）。

關於第二個問題，Wright（1979, 1980）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中，具有矛盾位置的階級，即中產階級，主要包括三大類：經理（managers）、小雇主（small employers）與半自主性受雇者（semiautonomous employees）。經理階級同時具有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特性；小雇主階級同時具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特性；而半自主性受雇者則同時具有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特性。這些矛盾位置本身並不構成一個適當的階級，它們都是推衍的位置，由其他階級的特殊組合所構成的。

但是，矛盾階級位置概念在理論與實證上並非就無缺點或困難。Wright（1985, 1990）指出：（1）矛盾階級位置之階級概念主要是從宰制關係（domination relations）上去加以界定，而非從剝削本身去界定。雖然宰制與剝削此二概念關係密切，但是，剝削才應是傳統馬派學者探討階級結構之理論重心；以及（2）自主性是矛盾階級位置之主要界定標準之一，但是在實證上，工作自主性很難加以操作，而且，在勞動過程中，它也是一個很難捉摸的概念。

因此，在提出矛盾階級位置概念在理論與實證上之一些問題之後，Wright（1985, 1990, 1999）嘗試由另一途徑去定位中產階級，即他所謂的多元剝削（multiple exploitations）概念。此探討取向嘗試以建基在剝削機制的社會關係概念去看階級結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除了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是最主要的剝削機制外，還有兩種剝削機制，雖然其重要性不如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那樣重要，但也不可忽視。此兩種剝削機制，即是建基在權威（對組織資產的控制）上之剝削，以及建基在技術或專業能力（稀有技術的控制）上之剝削。以此三種剝削關係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主要階級類別，如圖 1。

有生產工具				沒生產工具			
有權威		沒權威		有權威		沒權威	
有專業	沒專業	有專業	沒專業	有專業	沒專業	有專業	沒專業
1	2	3	4	5	6	7	8
專業資產階級	非專業資產階級	專業小資產階級	非專業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勞工

圖 1 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類別（多元剝削探討取向）

由圖 1 可以看出：這些剝削機制的不同組合，界定了不同的階級結構位置。因此，在階級結構的某些位置，經由不同之機制，可以同時是剝削別人與被別人所剝削。這些位置，乃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些同時具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位置，主要是經理（被資本主義體系所剝削，但在組織性權威上，又剝削他人）與專業人員（被資本主義體系所剝削，但又以擁有稀有技術或專業證照剝削他人）。

Wright (1985, 1990, 1999) 認為以多元剝削取向之觀點去探討階級結構，尤其是中產階級時，會比矛盾階級位置之探討取向多了以下之重要理論優勢：（1）建基在剝削取向之階級利益成為階級理論之探討重心，符合古典馬派理論；（2）技術與專業證照比起原先之工作自主性，在實證研究上，似乎更容易操作化。但是，以階級多元剝削之探討取向去定位中產階級，也會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Wright (1999) 認為那些掌控組織與稀有技術資源之受雇者，通常也參與勞動生產，故同時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也有貢獻。因此，他們以收入、技術報酬或獎金等形式分得到一些剩餘價值，可能僅意味著他們受到資本家的剝削，與勞工

階級相比而言，相對地比較少，而非實際剝削他人。假如實際是如此的話，能否在階級結構上視他們為一獨特的階級位置之看法，就顯得不是那麼清楚。或許祇能視為某一階級內之層級（strata）而已。

在說明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與分類之發展後，接著說明當代學者對於階級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形成的關聯性之論點。延續著馬克思的觀點，Giddens（1973）進一步指出：代間的階級不流動，導致共同生活經驗的傳承；而踏入勞動市場後，工作生涯之不流動，使得工作報酬侷限於類似的水平；這都強化了經驗的同質性，促成可認同的階級之形成。Parkin（1979）也指出流動模式關聯到階級形成；而工會或專業組織限定個人資格，排除不合資格者進入組織；它也限制團體間的交換，以便獨佔資源，此也有助於內團體之形成。除了流動的封閉性之外，Parkin又進一步論及社會交換或網絡的封閉性，有助於階級形成。

既然在理論上，階級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形成有密切的關聯，許多經驗研究也就以流動表與網絡表分析階級（層）流動或網絡結構，及其所涉及的流動或互動障礙，此即階級界限之所在。然而要做此分析，首先要選用一項適當的階級分類，以凸顯整體的階級流動或網絡結構，與階級界限之所在。前面已說過，若要分析階級間的衝突與所導致的進一步社會變遷，則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如Wright（1999）基於剝削關係所建立的階級分類，特別是多元剝削取向的階級分類，顯得比較適當。

相較於國外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之發展，許多國內階級研究者採用韋伯的階級概念，分析階級流動結構（謝雨生、余淑娟 1990；孫清山、黃毅志 1997；Tsay 1997；吳乃德 1997）；也有一些研究者參考古典馬克思理論或對其略做修正（Wright and Perrone 1977）的階級分類，分析階級流動結構（許嘉猷 1990a；熊瑞梅、黃毅志 1992）。不過根據Wright（1979, 1980）的矛盾階級位置概念，詳細分析階級流動結構，或

根據更新的Wright (1985, 1990) 多元剝削取向分析階級流動結構的量化研究，就不容易看得到。

許嘉猷 (2000) 同時運用Wright的矛盾階級位置概念，以及多元剝削取向分析臺北市階級流動結構的實證研究。研究發現顯示：

- (1) 採用矛盾階級位置概念做分析時，由於工作的自主性不容易操作化，導致許多職業為專業或半專業工作者被歸類為沒自主性的工人。而進一步採用多元剝削取向做分析，以大專以上學歷作為專業或半專業人員之階級的指標時，許多職業為專業或半專業工作者，就因高學歷而被歸類為專業或半專業階級，而非工人，這顯得較適當。
- (2) 根據多元剝削取向，將臺北市民分為資產階級、小雇主、小資產階級、經理階級、專業或半專業階級，以及勞工共六大階級的分佈方面，經理階級與專業或半專業階級所組成的中產階級佔臺北市民階級分佈的一半；工人佔了四分之一，而小資產階級佔了八分之一，仍是不可忽視的社會類別。
- (3) 在代間階級流動方面，階級流動率約佔四分之三，這主要可歸因於臺灣整體的社會結構變遷；而兩代之間黑手變頭家（工人變老闆）的比率約為五分之一，代間的「黑手變頭家」仍是重要的流動管道。

這項研究顯示，Wright的階級多元剝削取向優於原先的矛盾階級位置概念，以及對臺北市階級結構的特性，有相當程度的探討與瞭解；然而也受到下列的限制，而有待進一步研究之發展：

- (1) 它所做的流動表分析，僅限於臺北市樣本，而且所分析的流動歷程，僅限於代間流動。今後的研究可進一步採用多元剝削取向，分析全國性樣本的代間與代內流動；特別是分析在理論上

有重要意義的代內之「黑手變頭家」之流動（謝國雄 1989a，1997）。因為它有礙於工人階級之形成（謝國雄 1989a，1997），而階級形成乃是古典馬克思理論之重要議題。

- (2) 它並沒對多元剝削取向流動表的分類基礎，即三面向之階級分類中，不同階級位置間的階級界限之可滲性，即不同階級位置的成員間之流動，以及親密互動，如交友與通婚的可能性、開放性，做進一步分析。Wright與其研究夥伴（Western and Wright 1994; Wright and Cho 1992）則曾對此可滲性的問題做過實證分析，可做今後的國內研究之參考。

（三）Wright以多元剝削取向探討階級界限之可滲性的研究

Wright與其研究夥伴（Western and Wright 1994; Wright and Cho 1992）指出：不同階級位置間的流動或親密互動（如交友、通婚）之可滲性過低，會導致階級衝突與階級形成。多元剝削面向上不同階級位置間之可滲性，這包括擁有生產工具與沒有生產工具者間、擁有權威與沒有權威者間，以及擁有專業與沒有專業者間的流動或親密互動之可滲性究竟如何？相對高低又是如何？也就成爲Wright所做的經驗研究之探討焦點。

Wright and Cho（1992）根據美國、加拿大、瑞典及挪威的資料，以對數線性模型分析不同階級位置間交友的可滲性。他們發現，在四國中，擁有生產工具與沒有生產工具者間交友的可滲性最低，擁有權威與沒有權威者間交友的可滲性最高，擁有專業與沒有專業者間交友的可滲性居中；而這三面向的可滲性，在各國之間可說沒有差異。他們並將有無生產工具者間的可滲性最低，歸因爲兩者間的敵對性最強；有無權威者間交友的可滲性最高，歸因於在工作場所裏，兩者往往有面對面互動

的機會，而提高交友機會，而且兩者間在工作生涯上有許多代內流動機會，這也會增加交友機會；至於有無專業者間交友的可滲性也不高，可歸因於兩者的文化資本與生活風格不同，妨礙著兩者間的交往。

Western and Wright (1994) 則同樣根據上述四國的資料，以對數線性模型分析不同階級位置間的可滲性，不過所分析的是代間流動，而非交友的可滲性。研究發現顯示：在四國中，三面向的可滲性仍都很類似，都以有無權威者間流動的可滲性最高；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中，仍以有無生產工具者間流動的可滲性最低，有無專業者間流動的可滲性居中；不過強調社會主義，淡化資本主義色彩的瑞典及挪威，有無生產工具者間流動的可滲性就不是特別低，而與有無專業者間的可滲性並無顯著不同。他們將有無生產工具者間的低流動可滲性，歸因於有產的親代不但很容易將生產工具轉承給子代，也很容易在財務上贊助子代創業，而無產的親代無法提供同樣的幫助，子代也就不易擁有生產工具；然而親代權威的擁有，如經理所擁有的權威，卻很難轉承給子代，有無權威者間流動的可滲性也就最高；至於有無專業者間流動的可滲性也不高，可歸因於有專業的親代往往文化資本也較高，透過文化資本之傳遞，使得子代容易取得高學歷，以及需要高學歷的專業工作。Western and Wright 並進一步分析這四國不同階級位置者通婚的可滲性，而發現四國三面向可滲性的排序依然都很類似，大致而言，由低而高，依序均為產權、專業與權威。

以上 Wright 等學者們的階級研究固然有其重要貢獻，然而這些研究都沒對代內流動做實證分析，他們在國外對交友、通婚網絡與代間流動所做的三面向可滲性分析之結論，是否能適用於國內，也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之釐清。本研究則參考 Wright 的研究架構，根據所蒐集的全國性樣本資料，對於國內代間、代內階級流動的三面向可滲性做對數線性分

析，以檢視比較Wright的研究結論在國內的適用性以及其間之異同。在做此實證分析前，仍須對過去根據非馬克思傳統所做的代內流動研究之理論意義與研究發現作回顧，以助於對往後資料分析的理解。

(四) 非馬克思理論傳統下的代內流動研究

由於本研究的探討主題之一即是從新馬之觀點實證探討代內階級界限與可滲性之問題，此可說是新馬學者以往所沒做過的，故也可說是本研究的貢獻。而在開始探討之前，得先簡單回顧非馬克思理論傳統下的代內流動研究。本研究將從最重要的地位取得研究開始回顧與探討。在古典的地位取得研究（Blau and Duncan 1967; Sewell and Hauser 1975）中，對於個人代內職業生涯流動（career mobility）的討論，是以教育、初職、現職與收入幾個主要概念來探討。教育影響個人初職之取得，教育與初職則影響現職之取得，而教育、初職與現職再影響到個人之收入。然而，對於其中影響的過程與機制，以及理論之闡釋，基本上並無多大的說明，其中之批評與討論、文獻極多（許嘉猷 1986；蔡淑鈴、瞿海源 1992；薛承泰 1996；黃毅志 1999；蔡瑞明、林大森 2000），茲不再贅述。而後續對於地位取得的過程與機制，以及理論之闡釋，主要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本出發點，再加以補充或修正。古典的人力資本理論（Becker 1964; Mincer 1974）視教育為一種投資，而日後的收入便是這種投資的回報；而人們願意投資，是因為認為教育使人獲得技能，而這些技能可使個人將來就業時發揮更高的生產力，而獲得更高的報酬。同時，隨著時間的拉長，教育、訓練與經驗愈豐富者，其工作報酬也愈高。但是人力資本理論是立基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完全競爭市場此一基本假設上，如果此一基本假設不見得適用某一社會的實際狀況時，此一理論便有修正之必要，因此有爾後的勞力市場、性別與種族隔

離等建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新結構論之興起，以補助或修正人力資本理論之不足，尤其是晚近對經驗（年資）、教育之類別（分流），以及個人職位所匯集的位置資本（positional capital）之更深入之闡釋與實證探討（Neal 1995; Tam 1998；許嘉猷 1981；章英華等 1996；薛承泰 1996；黃毅志 1999；蔡瑞明、林大森 2000）。然而，上述這些理論與經驗研究，基本上並無直接探討階級之封閉性或可滲性之問題。欲從非馬克思理論傳統探討階級可滲性問題，還是得回到 Weber 對社會階級之定義為基本出發點。

依 Weber（1978:302-307）的觀點，階級不僅可反映在代間職業流動機會的模式上，也反映在代內職業流動的模式；具有相同流動機會的職業，即可劃歸同一社會階級。而代內職業生涯流動較能表現某類型職業的慣性（inertia），亦即進了某項初職後就不易流出，他項職業者也不易流入的阻力；代內流動特別能看出流動的障礙。由於進入某項初職後，在工作經驗或訓練上所得到的特殊技能，即職業特殊人力資本，不容易轉換成適用於其他職業的特殊技能；加上許多就業者往往在離開學校後，踏入勞力市場取得初職，在普遍重視教育文憑的勞力市場裏，既有之教育文憑往往又構成流動障礙，在代內流動中也就顯得障礙重重（Stier and Grusky 1990; Goldthorpe et al. 1980:54, 121）。而若由代間流動的模式看階級，會混淆了父親透過教育而對兒子職業的間接影響，以及父親對兒子職業直接影響兩種作用；然而若由一個人的初職和現職的流動來看職業流動的慣性，則可去除教育所造成的流動之干擾作用（Snipp 1985）。因此，Snipp 採用 Weber 的相同流動機會去定位社會階級和探討代內職業生涯流動，Snipp（1985）的經驗研究指出，如果以相同的職業生涯流動作為階級界限的區分標準，則美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粗略劃分為農民階級、藍領階級和白領階級，意即三者之間有相當程度

之階級封閉性，彼此互滲的機會不高。另外，以韋伯的相同流動機會的社會階級意涵，連結社會階級於職業流動的經驗研究中，還包括 Goldthorpe 等人（1980）、Clogg（1981）、Breiger（1981）、Marsden（1985）以及國內的謝雨生（謝雨生、余淑娟 1990）等人。不過，他們的探討重心大多是在代間流動，而非代內職業生涯流動，有興趣者可參閱上述謝雨生教授之研究。

接著回顧國內在非馬克思傳統下所做的代內階級界限與可滲性之經驗研究發現；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不過，孫清山與黃毅志（1997）曾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他們將職業劃分為四大類，其層級高低依次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買賣服務人員、勞動工人，以及農民；他們所做的初職到現職代內流動表對數線性分析顯示：同屬高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流動機會偏高，同屬低層的工、農間之流動機會亦均偏高；不過有一個流動的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而少有跨界限的流動。他們並就此代內流動的界限，與從父職到初職，以及父職到現職的代內流動界限作比較，發現以代內流動之界限最難跨越；他們的解釋是：

- (1) 臺灣的勞力市場重視學歷，以工、農為初職者教育程度較低，由於學歷不足，難以跨越階級界限，流動到以較重視學歷的專技管理佐理或買賣服務工作為現職，特別是與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階級界限，更難跨越。
- (2) 以工、農為初職者在工作經驗或訓練上所得到的特殊技能，即特殊人力資本，不容易轉換成專技管理佐理或買賣服務工作所須要的特殊技能。

教育程度較低者，雖然因學歷不足，難以跨越以教育為主要管道的代內職業流動。不過，此並不意味他們就無上升之路。在臺灣，另有一

條重要的流動管道，提供給教育程度較低之工人或農民的流動管道，此即黑手變頭家，尤其是小頭家，這包括小資產階級與雇有少數員工的資產階級之階級流動（謝國雄 1989a）。謝國雄（1989a，1997）的田野個案研究嘗試分析探討臺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其重點在探討黑手變頭家的結構環境、過程與結果。他認為臺灣在工業化過程中，製造業從業人口有普羅化之趨勢，不過產業結構也有零細化，而勞動者之職業生涯中有去普羅化和小頭家化的趨勢。整體而言，臺灣特殊的產業結構（例如零細化與外包制度）帶來代內階級流動之機會。但是，由於黑手變頭家有懷柔工人，使工人產生「擬似頭家意識」，以及製造對資本主義共識的效果，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和階級結構，得以再製（re-production），反而有礙勞工階級的形成。

謝國雄的研究取向，在本節的國內代內職業生涯流動文獻探討中，可說是較為接近新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不過，他的田野個案的質化研究，卻又與Wright的階級流動的調查統計資料之量化經驗研究大異其趣。他的研究，對吾人瞭解臺灣產業結構之特質，以及在此特質之下所形成的階級意識與階級流動特色甚有幫助。同時，他的研究也直接觸及產權此一面向的階級可滲性之研究主題。不過，純就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而言，謝國雄對製造業黑手變頭家的田野個案研究結論，是否可概括到整體製造業或整體就業人口？產權的階級界限可滲性與其他二個面向（專業與權威）的可滲性，以及此三面向的可滲性之高低排序，在臺灣的情況又是如何？仍未直接討論。此也是本研究所要繼續探討的主題之一。

（五）跨越階級界限的三面向之排序假設

在檢討過新馬克思主義者Wright有關交友、通婚與代間流動的三面

向階級可滲性的理論與研究之後，接著依新馬克思主義與Bourdieu的理論，提出有關三面相階級代間流動的可滲性排序之假設，以供本研究做經驗檢證。

依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無生產工具（產權）者間的代間階級界限之可滲性應當很低，這是因為有產權的親代不但很容易將產權直接轉承給子代，也很容易在財務上贊助子代創業；而無產權的親代無法提供同樣的幫助，子代也就不易擁有產權（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1）。依Bourdieu的觀點，有無專業者間代間階級界限的可滲性也很低，這是因為有專業者的親代往往教育高，文化資本也較高，透過文化資本之傳遞，使得子代容易取得高教育，以及須要高教育的專業工作；而無專業者的親代文化資本不足，無法提供子代同樣的幫助（Bourdieu 1977, 1984;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1-612）。然而親代權威的擁有，如經理所擁有的權威，都很難像產權或文化資本般地可轉承給子代；不論依新馬克思主義者或Bourdieu的理論，有無權威者間代間流動的可滲性都會最高（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1-612）。

再就有無產權與有無專業者間的代間流動之可滲性作比較。依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權的私有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價值的資源分配之最主要基礎，有無產權間的代間階級界限可滲性應當較低（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1-612）；但如果依Bourdieu的理論，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裡，文化資本才是有價值的資源分配之最主要基礎，有無專業間的教育與文化資本的差異在代間之延續，使得有無專業者間代間階級界限的可滲性較低（Bourdieu 1977, 1984;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1-612）。

根據上述理論探討，可對階級代間流動，這包括從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與子代現階之流動，提出下列兩項對立假設：

假設 1：三面向階級代間流動之可滲性，從低而高，依序為：

(1) 產權 (2) 專業 (3) 權威 (依新馬克思主義)。

假設2：三面向階級代間流動之可滲性，從低而高，依序為：

(1) 專業 (2) 產權 (3) 權威 (依 Bourdieu 理論)。

至於三面向階級代內流動可滲性之排序，則 Wright 與 Bourdieu 都沒清楚地指出，而且也不容易根據他們的論述做推論，而清楚地提出假設。本研究也就先不提出代內流動可滲性排序之假設，而在做完經驗研究後，再檢討這項排序，這也是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

(六) 與本研究有關的臺灣社會階層與階級流動的重要特色

由於臺灣社會階層的階級流動中，可能具有許多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可能導致臺灣的階級界限之可滲性有些可能符合，也有些可能不符合 Wright 與 Bourdieu 的理論，在此必須加以說明；在結論與討論中，再根據本研究依理論所提出之假設的檢證結果，與臺灣的重要特色，來檢討 Wright 與 Bourdieu 理論在臺灣的適用，以及臺灣與 Wright 所研究的四個歐美國家之不同的原因所在。

1. 教育的重要性與專業的低可滲性

在臺灣社會裏，「教育」除了對於其他階層變項，如職業、收入、階級，往往有著重大影響，可作為提高其他階層變項的工具外，其本身也代表著很重要的階層區分，這反映出臺灣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特別重視教育之特殊文化傳統（許嘉猷 1982；蔡淑鈴、瞿海源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5；黃毅志 1999）。而臺灣的教育取得仍深受家庭背景影響的情況下（蔡淑鈴、瞿海源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6；章英華等 1996），親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子代的教育取得往往也很高，有助於取得需要高學歷的專業工作，故有無專業者間的

代間流動之可滲性可能不高。至於工作生涯的代內階級流動，在臺灣，由於就業者在踏入勞力市場後，透過繼續接受教育而取得專業工作的機會，在本研究所分析資料的調查時間（1992年）還不是很多，有無專業者間的代內流動之可滲性可能更低（孫清山、黃毅志 1997）。

2. 私人企業規模不大與產權的可滲性

由於臺灣的私人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雇用員工的規模不大，有生產工具的老闆，即使是雇有員工的資產階級，往往也都是小老闆，資產也不是很大（謝國雄 1989a；許嘉猷 1994a）。臺灣中小企業林立的產業結構特色，給許多所需資產不大的小老闆創業之機會，這有其重要的運轉機制：在製造業中規模較大的正式工廠將完整產品的生產過程，分解成許多細節，並透過外包或轉包制（subcontracting system）（謝國雄 1989b:30；許嘉猷 1994b:23），將許多工作細節分給許多中小企業老闆分別完成，這也就造成製造業中許多中小企業老闆創業與生存的機會（謝國雄 1989a，1997）。而除了製造業外，服務業也提供了許多小老闆，如非正式部門中攤販的創業機會（熊瑞梅、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5）。因此，固然有產的親代很容易直接將生產工具轉承給子代（孫清山、黃毅志 1995），不過創業所需的資產不一定要很大，即使親代沒生產工具，子代要創業也不難，特別是在代內的工作生涯中，透過資金、人脈與技術經驗之累積，達成「黑手變頭家」的跨越有無生產工具者間階級界限之流動（謝國雄 1989a；熊瑞梅、黃毅志 1992）；因此，有無生產工具者間流動的可滲性可能不低。不過，在臺灣，農地取得相當困難，卻可能造成無產者變成農業有產者的流動障礙（謝雨生、余淑娟 1990）；就非農業工作者的流動而言，有無生產工具者間流動的可滲性可能較高。

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用的資料，乃是「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計畫」(Comparative Project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的臺灣團隊，於1992年8月至9月間所蒐集的18至65歲臺灣地區民眾之代表性大樣本調查資料(N=1491)。該計畫的創始人爲E. O. Wright，主要的目的是依照嚴謹的階級概念去設計問卷，蒐集有關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的系統性、國際性調查資料，供學者們比較研究之用(許嘉猷1994a，1994b)。

(二) 變項測量

本研究所要分析的是從親代階級，經子代初階，再到子代現階的階級流動之結構。根據圖1的多元剝削探討取向之主要階級位置，可依據在工作上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是否有權威，以及是否擁有專業技能，將親代階級、子代初階與子代現階，都分成八大階級位置。至於工作者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權威與專業的測量分別如下：

- (1) 生產工具：以自雇或爲家裏工作者爲擁有生產工具者，受雇者爲沒擁有生產工具者。
- (2) 權威：以有生產工具者中雇有員工者，或沒生產工具者中居管理職位者，爲有權威者；有生產工具者中沒雇員工者，或沒生產工具者中居非管理職位者，爲沒權威者。
- (3) 專業：參考Wright and Cho (1992:101)的方法，以是否從事專門技術職業來界定。¹

¹ Wright等人的研究(Wright and Cho 1992;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6)，依專業性

然而由於本研究的樣本還不夠大，在做流動表分析時，有些階級位置必須併類（參閱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09-610），共併成六類：²

將工作者分為專業人員、半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三個層級，並以跨越兩個層級的流動才算是跨界限的流動。本研究則由於樣本還不夠大，無法將專業性分為三個層級，以分析流動表與跨兩層級的流動。

² 本研究曾參考 Wright 等人的研究（Western and Wright 1994），進一步將此六類階級中專業人員，依專業層級高低再細分為專業人員與半專業人員，而得到七類階級，以進行流動表分析。不過如此的七分階級流動表，雖仍有些格子的樣本並不小，不過也有許多邊際次數太少，各格樣本太小，甚至於為零的問題（可參見附錄2）。這將會對數線性分析帶來問題（Agresti 1990:247; Bishop et al. 1975）；Agresti (1990:247) 指出：透過併類（如本研究併成六類），來降低各格樣本太小的問題並不是好方法，除非併類是很自然，而且訊息並不會因此而流失許多。雖然 Agresti (1990:249-250)，也曾指出許多在不併類的情況下，降低各格樣本太小問題的方法，不過這些方法都不是很理想；然而本研究併成六類階級，正是 Wright (1999:68) 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位置」（可參考正文圖2），不但很自然，而且又有堅強的理論基礎；而且透過如此併類，才能較清楚地分析也很重要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這關聯到階級形成的重大理論問題（參看 Goldthorpe et al. 1980:29），而可說還多得到一些重要訊息。

基於上述統計方法與理論的考量，本研究仍將階級併成六類。不過，本研究也曾依上述七類階級流動表，來分析從親代階級，子代初階到現階的對數線性模型；然而對模型參數重新估計的結果，並不改原先六分階級的結論；而且就這兩項分類不一樣的對數線性模型之適合度而言，不論就 G^2 或 Δ （模型預期各格次數與觀察次數的 index of dissimilarity）（Hout 1983:15），在所有的分析中，都仍以六類階級較佳（可參見附錄1）；比如，表2的最適模型4，表3、4的最適模型3，若改採七類階級， G^2 分別為 66、46、99， Δ 分別為 .066、.053、.087；都高於原表六類階級的 G^2 與 Δ （分別為 .060、.050、.058）。而本研究並沒用 BIC 來選擇不同分類中之最佳模型，因為這與通常在相同分類中，用 BIC 來選擇最佳模型有所不同，而可能會有問題；比如在七類的階級流動表中（ $N=1000$ ），初階級與現階級完全沒關聯（或接近沒關聯），則獨立模型的 G^2 為 0（或接近 0）， $BIC=G^2-df*\log(N)$ （Raft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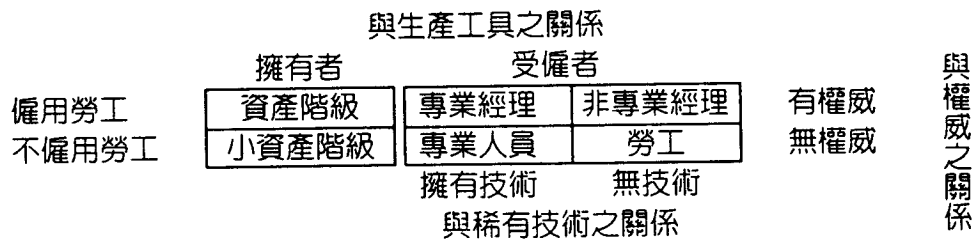
- (1) 資產階級：這絕大多數是圖1上的非專業資產階級，不過也包括極少數的專業資產階級；就子代現階做說明，子代現階為資產階級中，祇包括10.4%的專業資產階級，其餘89.6%皆為非專業資產階級。
 - (2) 小資產階級：這絕大多數是非專業小資產階級，不過也包括極少數的專業小資產階級；就子代現階做說明，子代現階為小資產階級者中，祇包括4.8%的專業小資產階級，其餘95.2%皆為非專業小資產階級。
 - (3) 專業經理：此即圖1上沒生產工具，有權威，也有專業的專業經理。
 - (4) 非專業經理：即圖1上沒生產工具，有權威，沒有專業的非專業經理。
 - (5) 專業人員：即圖1上沒生產工具，沒權威，不過有專業的專業人員。
 - (6) 勞工階級：即圖1上沒生產工具，沒權威，也沒專業的勞工。
- 以上六類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位置，以圖表示，請見圖2。至於親代階級、子代初階與子代現階的界定分別是：

1986)，為 $0-36*6.91=-249$ （或接近-249）；經併類成六類的階級流動表後，初階級仍與現階級完全沒關聯，BIC為 $0-25*6.91=-173$ ；類別少的簡潔模型，BIC反而高，而被拒絕，並不合理。

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主要根據理論，而輔以數據來決定階級類別數，而非主要根據數據做決定；如果主要根據數據做決定，可能還會面臨「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以及子代初階到子代現階，這三個流動表的類別數，並不相同」的問題，這將給流動表的分析帶來很大的困難；而在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的研究中，這三階段流動過程的分析都採用相同分類。

基於以上理由，本文還是以六分類階級進行分析。不過仍在附錄2中提供三個7*7交叉表，讓同領域的其他社會科學家，有提出不同解釋的機會。

- (1) 親代階級：指受訪者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的主要負擔者，這不一定指父親的階級。³
- (2) 子代初階：指受訪者27歲時的階級。本研究採用27歲時的階級，而非常用的第一個工作之階級定義初階，理由是：第一個工作很可能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如找到合適的工作前，臨時打雜的工作；而27歲時的工作，較可能是穩定的工作。故在本計畫之國際與國內之間卷表上，皆以27歲時的階級為初階。⁴
- (3) 子代現階：指受訪者現在的階級。



資料來源：Wright (1999:68)

圖2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位置：多元剝削探討取向

³ 本研究與Wright等人一樣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5)，都以受訪者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的主要負責擔者之階級，代表親代階級。然而不論是在Wright等人的研究或本研究中，親代階級絕大部份是父親階級，本研究中為父親階級的比率即高達86.4%，其餘大部份是母親；不論是在Wright等人的研究或本研究中，少數非父親的負擔家計者之階級，也都用來代表親代階級。由於臺灣親代階級絕大部份即父親階級，若改採父親階級來分析代間流動，研究結果當不會有多少改變；不過這反而會使研究結果更難與Wright等人的研究做比較。

⁴ 事實上，本問卷表當初在美國與歐洲試測時，是以25歲時為初階，不過在試測結果的討論時，Wright與參與試測的與會學者們認為：受訪者在完成教育與義務兵役之後，大多數在27歲之後，都已有較為穩定之工作，為求問卷表在各國之適用，以及避免受訪者還沒有穩定的正式工作，因此，乃以27歲為受訪者之初階。而受訪者之工作史問卷表上，也是以27歲、37歲、47歲為基準年齡。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臺灣民眾從親代階級，經子代初階，再到子代現階的階級流動之結構，所用到的統計分析方法，除了百分比流出、流入表之外，並參考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5-619) 的跨界限 (boundary-crossing) 對數線性模型，同時分析 6*6 階級流動表中，有無生產工具、有無權威，以及有無專業技能者間流動的可滲性，以顯現整個階級流動過程的流動結構。而本研究的對數線性模型各格的互動項，基本上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ln R_{ij} = \text{準獨立參數 (QI)} + P + A + E$$

在這個式子中， R_{ij} 為流動比， $\ln R_{ij}$ 即為互動項。準獨立參數在流動表對角線的六個格子中，各有一個參數，分別是 QI_1 、 QI_2 、 QI_3 、 QI_4 、 QI_5 、 QI_6 ，用來代表臺灣民眾從過去的階級到後來的階級間，在各階級位置內不流動或封閉的傾向；數值越大，代表不流動的傾向或相對機會越大 (Goldthorpe et al. 1980)。不過本研究所做的資料分析都顯示，對角線上各格不流動傾向大都很接近，用一個簡潔參數，代表對角線上各格有相同的不流動傾向反而更理想；這個參數即是齊一不流動參數，所顯示的統計模型即為齊一不流動模型，為準獨立參數所顯示的準獨立模型之一種特例。

P 則代表跨越有無生產工具間階級界限的流動可滲性之參數，在圖 3 流動表的設計矩陣 (Design Matrix) 上，以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為有生產工具，其餘為無生產工具者，並以跨越界限的格子為 1，沒跨越的為 0。A 為代表跨越有無權威間階級界限的流動可滲性之參數，以資產階級、專業經理與非專業經理為有權威者，其餘為無權威者，並以跨越界限的格子為 1，沒跨越的為 0。E 為代表跨越有無專業技能間階級界限的流動可滲性之參數，以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為有專業者，其餘為無

專業者，並以跨越界限的格子為1，沒跨越的為0。這三個參數若為負值，則代表跨越界限的流動存在著障礙；負得越多，代表跨階級界限流動障礙越大、機會越小，而可滲性越低。

除了以上的互動項方程式之外，很類似地，各格期望次數可表示為：

$$\ln F_{ij} = \mu + \lambda_{xi} + \lambda_{yj} + QI + P + A + E$$

μ 為主效應， λ_{xi} 為列效應， λ_{yj} 為行效應。

A 跨越生產工具界限之設計矩陣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資產階級	0	0	1	1	1	1
小資產階級	0	0	1	1	1	1
專業經理	1	1	0	0	0	0
非專業經理	1	1	0	0	0	0
專業人員	1	1	0	0	0	0
勞工階級	1	1	0	0	0	0

B 跨越權威界限之設計矩陣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資產階級	0	1	0	0	1	1
小資產階級	1	0	1	1	0	0
專業經理	0	1	0	0	1	1
非專業經理	0	1	0	0	1	1
專業人員	1	0	1	1	0	0
勞工階級	1	0	1	1	0	0

C 跨越專業界限之設計矩陣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資產階級	0	0	1	0	1	0
小資產階級	0	0	1	0	1	0
專業經理	1	1	0	1	0	1
非專業經理	0	0	1	0	1	0
專業人員	1	1	0	1	0	1
勞工階級	0	0	1	0	1	0

圖3 本研究階級流動表之設計矩陣

根據上述流動表的設計矩陣，此對數線性模型符合了準對稱條件，能有效剔除百分比交叉表上行列邊際次數之不同，如常見的代間勞工階級邊際分佈不同的普羅化鉅視結構變遷（許嘉猷 2000），所造成的行列效應；而以QI、P、A、E等代表互動的參數，呈顯所謂的「相對流動機會」或「真正流動結構」（Sobel et al. 1985；孫清山、黃毅志 1997；Goldthorpe et al. 1980）。不過，Goldthorpe等人（1980:29）特別強調：固然要用到複雜的對數線性模型才能分析相對流動機會，用來代表「真正的」封閉性；而且除了行列邊際次數不同外，相對流動機會也會影響到百分比流出流入表所顯示的絕對流動（觀察流動）機會；然而對階級形成有直接影響的卻是絕對流動（觀察流動），這可用簡單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做分析。藉著流出表，可比較各不同背景者之現階層分佈所顯現的流動機會與機會不平等性，流動機會越小，機會不平等性越大，越有助於階級形成；藉著流入表，可分析各現階層者背景之分佈，同質性越高，越有助於階級形成。

四、資料分析結果

（一）臺灣地區民衆之階級分佈

從表1可看到：1992年受訪民衆的親代階級以小資產階級最多，高達43.4%，勞工階級居次（23.8%），資產階級也達18.5%，非專業經理階級也有10.2%，而同具專業性的專業人員（2.2%）與專業經理最少（1.8%）。親代為老闆，即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比率（61.9%）超過半數；進一步分析顯示，親代小資產階級的職業大多數為農（70.2%），資產階級為農的比率也不低（38.5%）。

相對於親代階級，子代（即受訪民衆）初階為小資產階級（27.7%）

與資產階級（4.2%）的比率就低得多，非專業經理（10.5%）比率幾乎不變，勞工階級（44.9%）卻高居第一，這可能反映出臺灣地區經歷從擁有生產工具的農民轉變成勞工階級的普羅化變遷，或者是要當老闆往往需要在工作生涯上累積相當的資源與經歷（熊瑞梅、黃毅志 1992；謝國雄 1989a），不太可能剛一開始就當老闆；這有待隨後做進一步分析。另外，專業人員比率（10.9%）卻提高許多；不過同具專業性的專業經理（1.9%）比率與親代也幾乎一樣，仍然很少。子代初階的缺失值特別高（N=576），這是因為子代最早的階級，祇測到27歲時的階級，許多子代尚未滿27歲，並不適合作答，而成爲缺失值。⁵

表1 臺灣地區民衆多元剝削取向階級分佈百分比

	親代階級		子代初階		子代現階	
	樣本數	有效樣本百分比	樣本數	有效樣本百分比	樣本數	有效樣本百分比
資產階級	264	18.5%	38	4.2%	135	10.2%
小資產階級	619	43.4%	253	27.7%	336	25.5%
專業經理	26	1.8%	17	1.9%	31	2.3%
非專業經理	146	10.2%	96	10.5%	169	12.8%
專業人員	32	2.2%	100	10.9%	105	8.0%
勞工階級	339	23.8%	411	44.9%	544	41.2%
缺失值	65	-	576	-	171	-
總樣本數	1491	100.0	1491	100.0	1491	100.0

⁵ 本研究之親代階級的缺失值比率可說很低（請參看表1）。子代現階的比率（11.5%）也不算高，而造成缺失值的，可能大都爲家庭主婦、學生與其他無工作者；不過由於在資料蒐集時，對於這些造成缺失值的樣本，並沒細分爲家庭主婦、學生或其他工作者來過錄資料，因而無法提供這三類樣本的具體百分比。子代初階缺失值的比率雖高（39%），這是因爲子代最早的階級，祇測到27歲時的階級，所有子代在26歲以下者，並不適合作答，而都成爲缺失值；27歲以上者，則只有28.2%爲缺失值。本研究的缺失值，大都不是漏答或不願意回答所造成，因此，非缺失值的階級分佈結果，當能代表母體；而缺失值並不會使結論產生多少偏差。

子代現階為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合起來的比率（35.7%），比起初階（31.9%）高出一些，非專業經理（12.8%）也提高一些；這可反映隨著工作生涯的發展，就業民眾的產權與權威都有所提昇；勞工階級（41.2%）、專業階級（8.0%）的比率則都下降一些；專業經理（2.3%）則仍然很少，而幾乎不變。子代現階為老闆的比率（35.7%），仍比親代少得多，這不能歸因於資歷不足，而當是從有生產工具的農民轉變成勞工的普羅化變遷所致。換言之，此應是反映臺灣在由農業社會逐漸轉變成工業社會下，許多農民的下一代為生計所迫，不得不離開田園與家鄉，而到都市討生活，成為勞工（許嘉猷 1990a；謝雨生、余淑娟 1990）。至於子代初階為勞工階級的比率，要比親代高得多，然而隨著工作生涯的發展，現階為勞工階級的比率雖仍比親代高得多，卻比初階少一些；這主要應是反映當老闆要累積相當的資源與經歷所致。

（二）從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流動結構

從表 2-1 的列百分比流出表可看到，親代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者，子代初階都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而都以小資產階級的比率居次；親代為資產階級者，子代初階也是資產階級的比率雖不高，不過為老闆的比率仍達 38.6%；親代為小資產階級者，子代為老闆的比率更高達 44%；這顯示即使在普羅化的變遷下，許多親代為老闆者，子代仍為老闆，仍有代間產權傳承的現象。親代為小資產階級者中，子代為專業經理、非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這些新中產階級的比率（12.9%）就低多了；不過親代為資產階級者中，子代為這些新中產階級的比率（25.1%）仍不低。

親代為專業經理者，子代初階則大都為新中產階級（77.8%），其中最多者為專業人員，其餘依次為非專業經理、專業經理。親代為非專業

經理階級者，子代初階則以勞工階級的比率（44.4%）最高，但傳承非專業經理（16.7%）的比率卻不高。親代為勞工階級者，子代初階也是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達57.6%），小資產階級居次（15.6%）。在普羅化的變遷下，親代除了同具專業性的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者之外，其餘四個階級者，子代初階都是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親代階級為專業人員者，子代初階則以同樣是專業人員的比率最高（45.0%），除了比親代為專業經理階級者的這項比率高出不多以外，比其餘四個階級者都高得多！

從表2-1的行百分比流入表可看到，在勞工階級擴充的普羅化過程之變遷下，初階為勞工階級者中，有許多親代並非勞工階級，而以小資產階級最多，勞工階級居次，資產階級第三。在專業人員也擴充的變遷下，子代初階為專業人員者中，親代大都不是專業人員。初階為非專業經理或專業經理者中，親代階級的異質性也都很大。而初階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者中，其親代階級大部份也都是有產權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比率分別為73.6%、82.7%；其次則是勞工階級，比率分別為15.8%、12.9%。

繼續對表2的流動結構做進一步的對數線性流動表分析，試圖找出簡潔而容易做詮釋，並能適合資料的對數線性模型，以呈現構成流動的三面向階級界限之可滲性，並做相關聯的統計推論。根據本研究流動表的設計矩陣，此對數線性模型符合了準對稱條件，能更有效地剔除表2行列邊際分佈之不同，如勞工階級邊際分佈不同的普羅化變遷所造成的效應，以呈顯所謂的「相對流動機會」或「真正流動結構」。

本研究針對所有樣本的代間流動，做對數線性分析時，選取最適模型的過程可參考表2-2 A。從親代階級與子代初階完全沒關聯的1獨立模型開始，逐漸增減參數。選擇最適模型所根據的是BIC值，不過也參考

表2 台灣地區民衆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流動表

2-1 百分比流出流入表

親代階級	子代初階							
	列百分比 行百分比	資產 階級	小資產 階級	專業 經理	非專業 經理	專業 人員	勞工 階級	列小計
資產 階級	8.2 36.8	30.4 21.0	2.3 25.0	11.7 21.5	11.1 19.4	36.3 15.9	171 19.3	
小資產 階級	3.7 36.8	40.3 61.7	.3 6.3	7.6 31.2	5.0 19.4	43.2 41.9	380 43.0	
專業 經理		11.1 .8	16.7 18.8	27.8 5.4	33.3 6.1	11.1 .5	18 2.0	
非專業 經理	4.4 10.5	6.7 2.4	6.7 37.5	16.7 16.1	21.1 19.4	44.4 10.2	90 10.2	
專業 人員		15.0 1.2		15.0 3.2	45.0 9.2	25.0 1.3	20 2.3	
勞工 階級	2.9 15.8	15.6 12.9	1.0 12.5	10.2 22.6	12.7 26.5	57.6 30.2	205 23.2	
行小計	38 4.3	248 28.1	16 1.8	93 10.5	98 11.1	391 44.2	884 100.0	

2-2 對數線性分析

A. 各模型適合度					B. 最適模型 4 參數估計		係數 (S. E.)
	G ²	df	P	BIC	專業可滲性參數		-.781* (.183)
1. 獨立模型	159	25	.000	-11	權威可滲性參數		-.371* (.113)
2. 齊一不動模型	92	24	.000	-71	產權可滲性參數		-.599* (.118)
3. 準獨立模型	77	19	.000	-52	齊一不動參數		.088 (.131)
4. 齊一不動模型 + 三個可滲性參數	50	21	.000	-93	各參數差距及其顯著性		
					專業 - 權威		-.410 (.215)
					專業 - 產權		-.182 (.218)
					權威 - 產權		.228 (.163)
5. 準獨立模型 + 三個可滲性參數	45	16	.000	-64	*表 P < .05		

傳統的 G²，做爲增減參數之參考。G² 可作爲統計顯著考驗的根據，然而在大樣本情況下，祇要模型的預測值與觀察值有微小的出入，就會在考驗中被拒絕。因而本研究也就根據不易受到樣本數影響的 BIC，作爲

選擇最適模型的主要標準。BIC由 G^2 、自由度(df)與樣本數做計算： $BIC=G^2-df*\text{Log}(N)$ 。依此標準，BIC值越低，模型越佳(適)(Mare 1991)；不過也說明傳統的 G^2 與統計考驗，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表2-2 A首先以親代階級與子代初階完全沒關聯的1獨立模型開始，作為模型比較的參考點。獨立模型的BIC為-11， G^2 高達159， $df=25$ ， $P=.000$ ，顯然不符資料。接著增加一個參數，用來代表對角線上各格具有同樣的不流動傾向，此即2.齊一不動模型，BIC迅速降到-71， G^2 降到92， G^2 降了42%，單是一個對角線上的參數，就相當能呈顯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關聯所在；不過這個模型並不能通過統計考驗($P<.05$)，還可繼續增加參數，更充份地呈現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關聯所在，以提高模型的適合度。模型3準獨立模型則用到6個參數，分別代表對角線上各格不流動的傾向，不過BIC卻回升到-52，這是因為多用了5個參數， G^2 卻祇下降到77所致；進一步檢查模型3的6個參數估計值後，發現參數值大都很接近， G^2 也就下降不多；而模型3本身也不能通過統計考驗。由於模型2優於3，模型4也就從2的齊一不流動參數，增加本研究在理論上最關心的三面向階級界限可滲性之參數，BIC降到-93， G^2 降到50，而且兩者的差別達到統計顯著($G^2=42$ ， $df=3$ ， $P<.05$)；不過在樣本相當大的情況下，模型4本身並不能通過傳統的統計考驗($P<.05$)。模型5則從3的準獨立模型出發，增加三向相階級界限可滲性之參數，不過BIC為-64，仍高於較簡潔的模型4，而且兩者的差別並未達到統計顯著。⁶

⁶ 本研究曾進一步參考Wright等人的研究(Wright and Cho 1992:95;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16)，在表2至表4的對數線性流動表分析中，都以五個虛擬變項的係數來代表工人階級與其他五個階級間的可滲性，卻發現加入這五個虛擬變項後，BIC都比表2至表4的最適模型為高。

綜合以上對表2-2 A的分析可知，模型4為最適模型。接著就根據表2-2 B模型4的參數估計值，來說明從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流動中，三面向階級界限的可滲性。三面向階級界限的可滲性參數都為顯著的負值，這代表要跨越三面向階級界限的流動，都有結構性障礙；其中又以專業的可滲性最低（-.781），產權（擁有生產工具）居次（-.599），權威（-.371）最高；在三個參數中，各參數的差距都未達顯著，這可能是樣本還不夠大所致，不過專業與權威的差距之P值為.056，已達常用顯著度（ $P < .05$ ）的邊緣。然而在加入三項可滲性參數後，代表對角線上各格具有同樣不流動傾向的齊一不流動參數影響並不顯著，這顯示表2-1百分比交叉表中，有些階級，如親代專業階級者，子代也是同階級比率特別高的現象，乃清楚反映出專業的可滲性很低；而親代為勞工階級者，子代也是同階級比率特別高的現象，反映出三面向的可滲性都是負值的累加效果。換言之，親代為勞工階級者，其專業、權威與產權都缺，使得子代難以跨越階級界限，而傳承了勞工階級的位置；這都不是對角線上自然就有傳承的現象。不過齊一不流動參數的影響雖不顯著，為了要與其他流動過程（見表3、4）做比較，表2上還是保留此一不顯著的參數。

（三）從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的流動結構

根據表3-1列百分比流出表，親代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者，子代現階都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這主要可歸因於由擁有生產工具之農民轉為工人的普羅化的變遷；而都以小資產階級的比率居次；親代為資產階級者，子代現階也是資產階級的比率（19.8%）也不低，為老闆的比率則高達40.5%；親代為小資產階級者，子代現階為老闆的比率更是高達43.4%。此顯示出：即使在普羅化的變遷下，許多親代為老闆者，

表3 台灣地區民衆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流動表

3-1 百分比流出流入表

親代階級	子代現階							
	列百分比 行百分比	資產 階級	小資產 階級	專業 經理	非專業 經理	專業 人員	勞工 階級	列小計
資產 階級	19.8 35.6	20.7 15.1	3.8 31.0	14.3 20.9	7.2 16.5	34.2 15.6	237 18.7	
小資產 階級	8.5 34.8	34.9 58.6	.9 17.2	9.2 30.7	5.7 30.1	40.8 42.8	544 42.8	
專業 經理	4.5 .8	9.1 .6	13.6 10.3	27.3 3.7	27.3 5.8	18.2 .8	22 1.7	
非專業 經理	9.8 9.8	15.8 6.5	6.8 31.0	18.8 15.3	9.8 12.6	39.1 10.0	133 10.5	
專業 人員	11.1 2.3	18.5 1.5		25.9 4.3	29.6 7.8	14.8 .8	27 2.1	
勞工 階級	7.2 16.7	18.6 17.6	1.0 10.3	13.4 25.2	9.1 27.2	50.8 30.1	307 24.2	
行小計	132 10.4	324 25.5	29 2.3	163 12.8	103 8.1	519 40.9	1270 100.0	

3-2 對數線性分析

A. 各模型適合度				B. 最適模型3參數估計		係數 (S. E.)
	G ²	df	P	BIC		
1. 獨立模型	138	25	.000	-41	專業可滲性參數	-.656* (.163)
2. 齊一不動模型	68	24	.000	-104	權威可滲性參數	-.343* (.086)
3. 齊一不動 + 可滲性參數	39	21	.011	-111	產權可滲性參數	-.271* (.091)
					齊一不動參數	.169 (.110)
各參數差距及其顯著性						
					專業 - 權威	-.313 (.184)
					專業 - 產權	-.385* (.187)
					權威 - 產權	-.072 (.125)
*表 P < .05						

子代現階仍為老闆，代間產權傳承的現象仍相當高。親代為資產階級者中，子代為專業經理、非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這些新中產階級的比率

(25.3%) 也不低；不過親代為小資產階級者中，子代現階為這些階級的比率 (15.8%) 就低多了。

親代為專業經理者，子代現階則大都為新中產階級 (68.2%)，其中最多者為專業階級與非專業經理，同是專業經理的代間傳承比率卻較低。親代為非專業經理者，子代現階仍以勞工階級的比率 (39.1%) 最高，同為非專業經理的比率 (18.8%) 就低多了。親代為勞工階級者，子代現階也是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 (50.8%)，小資產階級居次 (18.6%)。在普羅化的變遷下，除了親代同具專業性的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之外，其餘四個階級者，子代現階都是以勞工階級的比率最高；親代為專業人員者，子代現階則以同樣是專業人員的比率最高 (29.6%)，除了比親代為專業經理者的這項比率高出不多外，比其餘四個階級者都高得多！

根據表 3-1 的行百分比流入表，在勞工階級擴充的普羅化的變遷下，現階為勞工階級者中，有許多親代並非勞工階級，而以小資產階級最多，勞工階級居次，資產階級第三。在專業人員也擴充的變遷下，現階為專業人員者中，親代也大都不是專業人員。現階為非專業經理階級或專業經理者中，其親代階級的異質性也都很大。而現階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者中，其親代階級大部份也都是有產權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比率分別為 70.4%、73.7%；其餘大多是勞工階級，比率分別為 16.7%、17.6%。

接著進行對數線性分析，表 3-2 A 首先以親代階級與子代現階完全沒關聯的 1 獨立模型開始，BIC 為 -41， G^2 高達 138， $P=.000$ ，顯然不符資料。接著增加一個參數，成為 2. 齊一不動模型，BIC 迅速降到 -104， G^2 降到 68， G^2 降了 51%；不過這個模型仍不能通統計考驗。模型 3 又增加了三個可滲性之參數，BIC 又降到 -111。模型 3 在大樣本的情

況下 (N=1270)，已接近能通過傳統統計考驗 (P=.011)；而且模型3與2的差別也達到統計顯著 ($G^2=29$ ，df=3， $P<.05$)。本研究也曾依表2的程序，針對模型3的齊一不流動參數，以準獨立模型的6個參數取代，不過參數雖增加許多， G^2 為33，卻沒降多少，BIC反而提高至-81。綜合以上分析與說明，模型3乃被選為最適模型。

接著根據所選擇的最適模型3之參數估計值，說明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三面向階級界限的可滲性。三面向階級界限的可滲性參數都為顯著的負值；其中仍以專業的可滲性最低 (-0.656)，權威居次 (-0.343)，產權最高 (-0.271) 最高；在三個參數中，專業與產權的差距達到顯著，這也就是說，專業可滲性比產權可滲性更低，幾乎不可能是抽樣誤差所致。然而在加入三項可滲性參數後，代表對角線上各格具有同樣不流動傾向的齊一不流動參數影響並不顯著，這顯示表3-1百分比交差表中，有些階級，如親代勞工階級者，子代也是同階級比率特別高的現象，反映出三面向的可滲性都是負值的累加效果，而非對角線上自然就有傳承的現象。

(四) 從子代初階到子代現階的流動結構

根據表4-1的列百分比流出表，子代初階與現階都是同階級的比率都很高，依次為資產階級 (78.9%)、小資產階級 (70.3%)、專業人員 (62.6%)、勞工階級 (57.8%)、非專業經理 (56.3%)，專業經理的比率最低 (50.0%)，不過仍達到一半；這顯示代內工作生涯流動的高度封閉性。不過在現階為老闆，高出初階為老闆之比率的情況下，初階為勞工階級者，有25%現階變成老闆 (即頭家)，其中多數成了小資產階級；初階為專業經理者，有31.3%現階變成老闆，其中多數成了資產階級；初階為非專業經理者，有25.0%現階變成老闆，其中半數成了資產階

級；不過和專業經理、非專業經理一樣，初階同屬於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員，現階僅有10.1%變成老闆。而子代初階為勞工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勞工階級的比率都不高；這顯示出普羅化所造成的淪為勞工之流動，並非在代內，而是在代間流入初階時就達成了（已見於表2）。

子代初階為專業人員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專業人員的比率大都很低；其中最高的是初階為專業經理者，也祇有12.5%。不過加上現階為專業經理的比率，則初階為專業經理者，現階為專業性階級的比率為62.5%；初階為專業人員者，現階為專業性階級的比率更高達72.7%；子代初階為專業經理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專業經理的比率也大都很低；這都顯示出代內流動中，非專業性與專業性階級間的高度流動障礙。子代初階為非專業經理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非專業經理的比率就高多了，其中最高的是勞工階級（達14.1%）；子代初階為勞工階級者，有不少向上流動成頭家（25.0%）或非專業經理（14.1%）的機會，就是欠缺成為專業性階級的機會，其比率僅2.9%。此顯示勞工在去普羅化的代內職業生涯流動過程中，是往產權與權威此二面向滲透，而非往專業面向滲透；即勞工的去普羅化過程，包括了頭家化（尤其是小頭家化）（謝國雄 1989a）和經理化，而無專業化。究其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如前所述，專業人員之剝削機制的基礎，是建立在稀有技術、知識、文憑等專業能力上面，這些專業能力之訓練和培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並不是勞工在短短一代之間那麼容易轉變（代內）或轉承（代間）的。

從表4-1的行百分比流入表可看到，隨著工作生涯發展，資產階級比率提高的過程中，現階為資產階級者中，其初階有許多並非是資產階級；其初階以勞工階級最多（31.3%），其餘依次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非專業經理階級也不少，不過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卻都很少。現階

表4 台灣地區民衆子代初階到子代現階流動表

4-1 百分比流出流入表

	子代現階							列小計
	列百分比 行百分比	資產 階級	小資產 階級	專業 經理	非專業 經理	專業 人員	勞工 階級	
子 代 初 階	資產 階級	78.9 26.1	5.3 .8		7.9 2.3		7.9 1.0	38 4.2
	小資產 階級	11.6 25.2	70.3 67.0		4.0 7.5	1.2 3.9	12.9 11.0	249 27.6
	專業 經理	25.0 3.5	6.3 .4	50.0 33.3	6.3 .8	12.5 2.6		16 1.8
	非專業 經理	12.5 10.4	12.5 4.6	3.1 12.5	56.3 40.6	1.0 1.3	14.6 4.8	96 10.7
	專業 人員	4.0 3.5	6.1 2.3	10.1 41.7	8.1 6.0	62.6 80.5	9.1 3.1	99 11.0
	勞工 階級	8.9 31.3	16.1 24.9	.7 12.5	14.1 42.9	2.2 11.7	57.8 80.1	403 44.7
	行小計	115 12.8	261 29.0	24 2.7	133 14.8	77 8.5	291 32.3	901 100.0

4-2 對數線性分析

A. 各模型適合度					B. 最適模型3參數估計		係數 (S. E.)	
	G ²	df	P	BIC				
1. 獨立模型	792	25	.000	622	專業可滲性參數	-1.275*	(.177)	
2. 齊一不動模型	124	24	.000	-.39	權威可滲性參數	-.253	(.142)	
3. 齊一不動 + 三個可滲性參數	61	21	.000	-.82	產權可滲性參數	-.356*	(.137)	
					齊一不動參數	1.385*	(.149)	
					各參數差距及其顯著性			
					專業 - 權威	-1.022*	(.227)	
					專業 - 產權	-.919*	(.224)	
					權威 - 產權	-.103	(.197)	
					*表 P < .05			

爲小資產階級者中，初階仍以小資產階級最多（67.0%），其餘大多爲勞工階級。現階爲專業經理者中，初階大都爲專業人員或專業經理。現階

為非專業經理者中，初階也是非專業經理階級的比率雖高，不過勞工比率更高。現階為專業人員者中，則初階絕大多數同是專業人員（80.5%）。隨著工作生涯發展，勞工階級比率下降的過程下，現階為勞工階級者，其初階則絕大多數同是勞工階級者（80.1%）。

接著進行對數線性分析，表4-2 A 首先以子代初階與現階完全沒關聯的1獨立模型開始，BIC 高達622， G^2 高達792， $P=.000$ ，顯然不符資料。接著增加一個參數，此即2.齊一不動模型，BIC 迅速降到-39， G^2 降到124， G^2 降了84%；不過這個模型並不能通過統計考驗。模型3又增加了三面向階級界限可滲性之參數，BIC 降到-82， G^2 降到61；而且模型3與2的差別，也達到統計顯著（ $G^2=63$ ， $df=3$ ， $P<.05$ ）。本研究曾依表2的程序，針對模型3的齊一不流動參數，以準獨立模型的6個參數作取代，不過所用到的參數雖增加許多， G^2 為47，卻沒降多少，BIC 反而提高至-62。

由以上分析可知，模型3為最適模型。接著根據表4-2 B 模型3的參數估計值，說明從子代初階到子代現階的流動中，三面向階級界限的可滲性。三面向階級界限可滲性參數都為負值；其中又以專業的可滲性顯得特別低（-1.275），產權仍居次（-.356），這兩個參數都達到顯著；權威（-.253）最高，而且未達顯著；在三個參數中，專業與其他兩個參數的差距達到顯著。然而在加入三項可滲性參數後，代表對角線上各格具有同樣不流動傾向的齊一不流動參數（1.385）依然顯著，這顯示表3-1百分比交叉表中，子代為各項初階者，如子代初階為專業階級者，現階也是同階級比率特別高的現象，除了反映出專業等三面向的承續機制外，對角線上各格也另有承續的機制。

綜合以上表2至表4的分析，並比較在不同流動過程中，黑手（勞工階級）變頭家的比率。就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與現階的代間流動而

言，這項比率分別為 18.5% 與 25.8%；就子代初階到現階的代內流動而言，比率則為 25%。由此可見，在二十世紀末的臺灣社會裡，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界限之跨越，不論在代內或代間，都有結構性之障礙。但是，在此前提之下，還是存有黑手變頭家，尤其是小頭家（這包括小資產階級與雇有少數員工的資產階級）之機會，雖然其比率並不是很高，但也不低。此種情形，實與臺灣社會在 1960 年代以後，逐漸由農業社會轉變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工業社會的結構變遷，以及隨之引發之結構性流動，有很密切之關係（許嘉猷 1990a；謝雨生、余淑娟 1990）；加上在代內流動的過程中，國人「人人想當老闆」、「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社會文化特性，以及黑手自求多福、力爭上游的去普羅化過程（謝國雄 1989a；Sheu 1993）；此外，由於臺灣的私人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雇用員工的規模不大，有生產工具的老闆，即使是雇有員工的資產階級，往往也都是小老闆，資產往往也不是很大（謝國雄 1989a；許嘉猷 1994a）。固然有產的親代很容易直接將生產工具轉承給子代（孫清山、黃毅志 1995），不過創業所需的資產不一定要很大，即使親代沒生產工具，子代要創業也不難，特別是在代內的工作生涯中，透過資金、人脈與技術經驗之累積，達成「黑手變頭家」的跨越有無生產工具階級界限之流動（謝國雄 1989a；熊瑞梅、黃毅志 1992）。這些因素，都促進提高了頭家佔就業人口的比率，並陸續產生了代間和代內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初階為黑手者變成頭家後的現階之主要行業分佈，在現階為資產階級者方面，有 50% 為服務業，製造業祇有 13%，而農業更少（11%），不過營造業卻有 22%；在現階為小資產階級者方面，有 75% 為服務業，製造業祇有 11%，農業則為 13%。故黑手變頭家的重要結構因素，並非僅是謝國雄（1989a）所強調的「製造業」所提供之創業機會；更重要地，還包括服務業所提供之機會（熊瑞梅、

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5)。

綜合以上對表2至表4的分析，也引發了進一步的問題：老闆階級之代間、代內流動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是否主要是農地不易取得，農家產權之傳承仍具封閉性所致（謝雨生、余淑娟 1990）？在本研究所做的進一步分析中，針對親代階級與初階，親代階級與現階，以及初階與現階都是非農職業者，做代間與代內階級流動表分析，仍發現類似的封閉性與可滲性；可見上述的封閉性主要不僅是農家產權繼承之封閉性所造成的，而是與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息息相關。

此外，由於Wright（1997）曾針對學者們批評他對性別差異的討論付之闕如之問題，在*Class Counts*一書中加以討論，其中一個主要的探討主題即是比較男女兩性在工作權威的擁有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第12章），故本研究也依據本文研究資料，做臺灣性別間代內流動比較之對數線性分析，所得到的BIC值顯示：以性別在階級之邊際次數分佈不同，而且三個可滲性參數與齊一不動參數相同的模型為最佳模型。這反映出性別的階級分佈雖有不同，如不論在初階或現階，男性在擁有權威的資產階級與非專業經理的比率都比女性高，小資產階級比率也比女性高，而工人階級比率比女性低；不過本研究所關心的三個可滲性參數，男女卻沒多大差別。

五、結論與討論

先就親代階級到子代階級（不論是初階或現階）的代間流出表而言，親代為有產權的老闆（頭家），不論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者，其子代都以勞工階級（黑手）的比率最高，這反映出普羅化的變遷；而子代也是老闆的比率也很高，顯示在普羅化的變遷下，仍有代間產權傳

承的現象。親代為專業經理者，子代則大都為新中產階級，這包括了專業經理、非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親代為非專業經理階級者，子代則以勞工的比率最高。親代為勞工者，子代也是以勞工的比率最高。在普羅化的變遷下，除了親代同具專業性的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者之外，其餘四個階級者，子代初階都是以勞工的比率最高；親代為專業人員者，子代初階則以同樣是專業人員的比率最高，除了比同具專業性的親代專業經理這項比率高出不多以外，比其餘四個階級都高得多！

再就代間流入表而言，在勞工擴充的普羅化變遷下，子代階級為勞工者中，有許多親代並非勞工，而以小資產階級最多。在專業人員也擴充的變遷下，子代階級為專業人員中，親代大都不是專業人員。子代為非專業經理或專業經理者中，親代階級的異質性也都很大。而子代為老闆者，親代階級大部份也都是老闆，其次是勞工。

至於先前國內外研究，仍未看到以多元剝削取向探討代內階級流動的研究。本研究探討的結果則顯示：根據流出表分析，子代初階為各階級者，現階也是同階級的比率都很高；其中專業經理比率最低，卻仍達到一半，顯示代內工作生涯流動的高度封閉性；由於代內流動具高度封閉性，前述從親代階級到子代階級，不論是初階或現階的代間流動模式，也就顯得很類似。不過在現階為資產階級，高出初階為資產階級之比率，以及現階為老闆，高出初階為老闆比率之情況下，初階為勞工、專業經理與非專業經理者，現階仍都有許多成為老闆；不過，初階為專業人員者，現階卻很少為老闆。子代初階為勞工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勞工的比率都不高；顯示普羅化所造成淪為勞工之流動，並非在代內，而是在代間達成。至於子代初階為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以外各階級者，現階為這兩項專業性階級的比率都很低；而初階為專業性階級者，現階都有三分之二左右仍為專業性階級；這都顯示出代內流動中，非專業性

與專業性階級間的高度流動障礙。子代初階為非專業經理以外之各類階級者，現階為非專業經理階級的比率就高多了；子代初階為勞工者，仍有向上流動成頭家或非專業經理的機會，就是欠缺成為專業性階級的機會。顯示勞工在去普羅化的代內職業生涯流動過程中，是往產權與權威此二面向滲透，而非往專業面向滲透，即勞工的去普羅化過程，顯現出頭家化（尤其是小頭家化）和經理化現象，而無專業化現象。

根據代內流入表分析，隨著工作生涯發展，資產階級比率提高的過程中，現階為資產階級者中，其初階有許多並非是資產階級，其中以勞工最多，而少有專業經理與專業人員。現階為小資產階級者中，初階則以小資產階級最多，其餘大多數為勞工。現階為專業經理階級或專業人員者中，初階仍大都為專業經理或專業人員。現階為非專業經理者中，初階也是非專業經理階級的比率雖高，不過勞工比率更高。而隨著工作生涯發展，勞工比率下降的過程中，現階為勞工者，其初階絕大多數同是勞工。

本研究對於三面向階級界限之可滲性，所做的進一步之流動表對數線性分析則顯示：

- (1) 就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的代間流動過程而言，在三個面向的流動中，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或流動機會最低，有產權（擁有生產工具）與沒產權者間的可滲性居中，有權威與沒權威者間的可滲性最高。
- (2) 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的代間流動中，仍以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最低，有產權與沒產權者間之可滲性最高，而有權威與沒權威者間之可滲性居次。
- (3) 子代初階到現階的代內流動中，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特別低，有產權與沒產權者間之可滲性居次，有權威與沒權威者

間之可滲性仍最高。

綜觀上述三個流動過程中，三個面向的階級界限之可滲性，以專業與非專業者間的可滲性最低。這可能由於在臺灣特別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下，要擔任專業工作往往需要很高的教育，以及教育取得仍深受家庭背景影響，使得代間的教育流動仍受到限制（孫清山、黃毅志 1996），加上工作生涯中的教育流動更不容易，專業的可滲性，特別是代內流動的專業可滲性也就最低。這和孫清山與黃毅志（1997）的職業流動研究之發現與結論顯得很一致；他們的研究指出：臺灣的勞力市場重視學歷，以工、農為初職者學歷不足，難以跨越階級界限，流動到以較重視學歷的專技管理佐理或買賣服務工作為現職，特別是與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之階級界限，更難跨越。而有產權與沒產權者間的可滲性就高多了，這可歸因於臺灣眾多的私人企業規模往往不大，而提高許多所需資產不大的小老闆創業的機會（謝國雄 1989a；許嘉猷 1994a）。至於權威的可滲性，在三個流動過程中，有兩個以權威的可滲性最高，這與 Western and Wright（1994）的發現顯得一致；若依他們的解釋，親代的權威，如經理所有的，很難轉承給子代，從親代到子代初階之權威的可滲性也就很高；而在代間工作生涯流動中，往往祇要憑資歷與經驗，而不需學歷，就能從黑手升上經理階級，特別是低層的監督人員，如工頭、領班，權威的可滲性也很高。然而在三個流動過程中，權威的可滲性與產權可滲性的差距都很小，且都未達顯著，而可說都一樣高。

綜合以上有關臺灣三面向階級代間流動之可滲性的研究發現，不論就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或現階而言，可滲性最低的都是專業，而產權與權威可說一樣高；這不合依新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假設 1：階級流動可滲性，從低而高，依序為（1）產權（2）專業（3）權威」。臺灣社會特別重視教育的特殊文化傳統（黃毅志 1999），使得專業的可滲性最

低；而眾多的私人企業規模往往不大，提供許多小老闆創業機會之特殊產業結構，造成產權的可滲性也達一定程度；這都使假設1得不到支持，也不合Wright等人（Western and Wright 1994; Wright and Cho 1992）分析美國、加拿大、瑞典及挪威四國的階級代間流動，所得到「產權可滲性都很低，而專業可滲性沒特別高」的發現。而依Bourdieu理論所提的「假設2：階級流動可滲性，從低而高，依序為（1）專業（2）產權（3）權威」，專業可滲性最低得到支持；而產權可滲性低於權威卻得不到支持，這仍可歸因於臺灣有許多小老闆創業的機會。然而臺灣的專業可滲性最低的原因，並非如Bourdieu所強調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之特質」；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如美國、加拿大，專業可滲性卻低，這當是臺灣社會特別重視教育的特殊文化傳統所致。

臺灣三面向階級代間流動之可滲性的排序，與造成此排序的原因，都不符合假設1與假設2，這可歸因於臺灣社會的特殊性：

- （1）特別重視教育的特殊文化傳統：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下，要擔任專業性工作，如專業經理或專業人員，往往需要很高的高教育；親代為專業工作者，往往具有高教育，而在教育取得仍深受家庭背景影響，子代往往也具高教育，而仍擔任專業工作；反之，親代為教育不高的非專業工作者，子代往往也是教育不高的非專業工作者；專業的可滲性也就最低。
- （2）有許多小老闆創業機會的特殊產業結構：臺灣除了製造業的外包制，將完整的生產過程分解，造就許多小老闆創業機會之外（謝國雄 1989a, 1989b, 1997；許嘉猷 1994b），更重要的是服務業也提供了許多小老闆，如非正式部門中攤販的創業機會（熊瑞梅、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5）；由於創業所需的資產不一定要很大，機會又多，即使親代沒生產工具，子

代要創業也不難，產權的可滲性，也就可說與權威一樣高。

以上解釋臺灣三項可滲性排序的理由，可說是有別於新馬克思主義與Bourdieu的理論，而根據本土特殊性所提出的第三種理論基礎。至於臺灣三面向階級代內流動的可滲性，最低的仍是專業，產權與權威仍可說是一樣高，這也不合Wright等人（Wright and Cho 1992; Western and Wright 1994），於上述四國所得到之在階級間交友與通婚上，「產權可滲性仍都很低，而專業可滲性也沒特別高」的發現；仍可歸因於前述的臺灣特殊性。

再就臺灣三個流動過程各別的封閉性而言，以代內流動的封閉性最高，尤其是專業低度可滲性所造成的封閉性。不過子代初階為黑手者，除了欠缺變成具專業性的階級之機會外，仍有不少向上流動成老闆或非專業經理的機會；然而這些老闆，大都是非專業的小老闆，經理可能也有許多是工頭、領班，不一定能算是多面向與長距離的階級翻身；變成教育與聲望往往都很高的專業性階級（孫清山、黃毅志 1997；許嘉猷 1986：95-111），才比較像階級翻身，不過機會卻很少。然而本研究由於樣本還不夠大，祇能將階級分成六類，而不是圖1的八類，乃至於更精細的分類，也就無法對此「多面向與長距離之階級翻身」的問題做更精確的與更細緻的資料分析。

最後，綜觀本研究的學術貢獻與研究限制，本研究採用1992年蒐集的全國性樣本調查資料，根據多元剝削取向，進行代間、代內階級流動結構之分析，得到不少有關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的新發現與結論；話雖如此，所用的資料已蒐集了一段時間，樣本也還不夠大，無法採用更精細的分類，做更深入的分析。然而本研究所顯示的階級流動，當也反映出二十世紀末的臺灣社會之特性，例如當時專門技術職業的比率還不夠高，也就無法依專業性將資產、小資產階級分為專業資產、小資產階

級，非專業資產、小資產階級；當時民眾在踏入勞力市場後，透過繼續接受教育而取得專門技術工作的機會也不是很多，代內流動的專業可滲性也就很低。此外，國內學者（例如本文所述及的謝國雄、孫清山與黃毅志，以及許嘉猷等人）所探討的「黑手變頭家」此一重要主題的時期，也是擺在二十世紀末期。因此，與他們的研究做比較（尤其是與謝國雄的田野個案研究做實證研究之對比），也須擺在此時期。然而隨著後工業社會中高科技工業與服務業的成長，如資訊業的發展，專門技術職業的比率提高，可能造就許多專業資產或小資產階級的就業機會（許嘉猷 1990b；章英華等 1996；徐進鈺 1999；黃毅志 1999）；加上終身成人教育的推廣（魏惠娟 1998），許多民眾在踏入勞力市場後，也有繼續接受教育，乃至於「黑手變專業頭家」的翻身機會。爲了要探討比較 1992 年與 2000 年以後，高科技成長的臺灣社會之階級結構變遷及其間之異同，仍有待進一步更新、樣本更大的全國性調查與資料分析。

作者簡介

許嘉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爲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和藝術社會學。目前正從事 Bourdieu 的藝術社會學之研究，以及社會階層、文化品味與生活風格之實證比較研究。

黃毅志，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階層化、社會網絡、量化方法與教育社會學。目前正在從事「社會變遷、教育分流與個人事業成就」以及「社會網絡、職業取得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附錄1 合併臺灣與各國資料做嚴格跨國比較的技術問題

本研究與 Wright 等人 (Western and Wright 1994) 一樣，都有樣本不足，而必須將類似的階級位置併類的問題。如 Wright 等人 (P.608, 617) 就將也有技術的半專業經理併入專業經理；而本研究除了也將半專業經理併入專業經理外，也將半專業人員與專業人員合併，這就是本研究的六分類階級，與 Wright 等人的七分類階級之主要差異。不過 Wright 等人經過併類後的四國之七分類階級流動表，仍有邊際次數太少，甚至於為 0，與許多空格子的問題；這也就使他們無法藉著也很重要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分析各國有關階級流動與階級形成的問題 (參見 Goldthorpe et al. 1980:29)；並使流動模型之參數估計帶來問題 (P.615，註9)。

非常感謝一位非常專業的評審，提出「合併臺灣與前述四國資料，進行嚴格的跨國比較流動表分析」的修改建議，本研究也就進一步將半專業人員與專業人員分開，得到與 Wright 等人一樣的七分類階級；本研究依此七分類階級所得到的臺灣民眾百分比流出流入表，出現許多邊際次數太少與空格子的問題，這也就很難藉以分析有關階級流動與階級形成的問題。無論如何，本研究還是依此七分類流動表，仿照 Wright 等人的方法，以跨越兩層的為 1，其餘為 0 (P.616)，來分析從親代階級，子代初階到現階的對數線性模型；然而對數線性模型參數重新估計的結果，並不改原先六分類階級的結論；而且就這兩項分類不一樣的對數線性模型之適合度而言，不論就 G^2 或 Δ (模型預期各階次數與觀察次數的 index of dissimilarity) (Hout 1983:15)，在所有的分析中，都仍以六分類階級較佳，而這正是 Wright (1999:68) 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位置」(可參考正文圖 2)。

故基於流出流入表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經驗上的模型適合度或理論上基本階級的考量，本研究正文中對臺灣民眾資料的分析，也就仍採六分類階級。在確定臺灣資料應當用六分類階級做分析後，接著對於採用這位評審所提出的「合併臺灣與 Wright 等人的四國資料，做六分類階級流動表對數線性分析」之進一步建議，會面臨的問題做說明。由於本研究對臺灣所做的分析，包括從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子代現階兩項代間流動表，以及更重要的從子代初階到現階間之代內流動表；而 Wright 等人所分析的祇是從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之代間流動表；本研究所能與 Wright 等人的資料合併的，祇有臺灣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之流動表，然而此代間流動並不是本文探究的唯一重點。即使要合併臺灣與 Wright 等人的四國資料，對於從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的流動做對數分析，仍會面臨下列問題：

- (1) Wright 等人的流動表祇針對男性樣本做分析 (P.607, 註2)；而本研究所分析的樣本男女都有。如果本研究也祇針對臺灣男性樣本做分析，就會使樣本變得更小，而難以做較精確的流出流入表分析；而且分析的對象不含女性，這會使分析結果不能推論到整體臺灣民眾。即使合併臺灣男性樣本與 Wright 等人的四國資料做對數線性分析，也會因臺灣的樣本太小，而增添統計推論問題。
- (2) 本研究的職業分類採用「臺灣地區職業分類表」，即社會變遷調查的舊職業分類（如二期三次）；本研究並以從事專門技術職業者，視為擁有專業，包括專業與半專業人員。這與 Wright 等人的職業分類有所不同 (Western and Wright 1994:608; Wright and Cho 1992:100)；此將使合併資料之嚴格跨國比較帶來困難。

然而要進行跨國比較，也不一定要合併各國資料做分析。Wright 等人 (Pp.620-623)，也曾分別針對各國流動表做對數線性分析，分別針對各國的三項可滲性係數做比較，而得到各國階級界限可滲性排序不同之總結。

綜合上述，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探討臺灣社會本身有關階級流動與階級形成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以及進一步的三面向階級流動可滲性之比較，尤其是關聯到「黑手變頭家」，這項重大議題的代內流動問題；而非擺在受到資料限制，難以進行的合併各國資料之嚴格跨國比較。就本研究所關心的代內流動，並無資料可供合併，而合併各國代間流動資料做分析，也是問題重重。因而在論文題目上，本研究祇是「兼論……與歐美社會之一些比較」；在資料分析上，本研究也就參考 Wright 等人之研究 (Pp.620-623)，對於臺灣所得到的係數與各國各別得到的係數做比較與討論，並得到一些具有本土理論意涵的解釋。無論如何，更嚴格的合併臺灣與各國資料之跨國比較研究，仍有待進一步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提高本研究結論與 Wright 等人在經驗證據上更直接嚴謹的對話。整體而言，本研究仍是以 Wright 的多元階級剝削取向探討階級界限的跨越問題，而且對於階級之分類，也是從 Wright 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位置為出發點，同時，問卷表也是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的國際間共同之間卷表，在前述的一些因素之限制下，與 Wright 等學者們的研究做跨國的一些比較，相信仍應是適當的。

附錄2 七分類階級流動交叉表

附表1 親代階級到子代初階交叉表

	子代初階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半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列小計	
親代階級	資產階級	14人	52	4	20	11	8	62	171人 19.3%
	小資產階級	14	153	1	29	13	6	164	380 43.0
	專業經理		2	3	5	6		2	18 2.0
	非專業經理	4	6	6	15	14	5	40	90 10.2
	專業人員		2		3	4	2	4	15 1.7
	半專業人員		1			1	2	1	5 .6
	勞工階級	6	32	2	21	13	13	118	205 23.2
	行小計	38人 4.3%	248 28.1	16 1.8	93 10.5	62 7.0	36 4.1	391 44.2	884 100.0

出自

附表2 親代階級到子代現階交叉表

		子代現階							列小計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半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親代階級	資產階級	47人	49	9	34	7	10	81	237人 18.7%
	小資產階級	46	190	5	50	19	12	222	544 42.8
	專業經理	1	2	3	6	5	1	4	22 1.7
	非專業經理	13	21	9	25	10	3	52	133 10.5
	專業人員	2	4		6	4	2	3	21 1.7
	半專業人員	1	1		1	1	1	1	6 .5
	勞工階級	22	57	3	41	16	12	156	307 24.2
	行小計	132人 10.4%	324 25.5	29 2.3	163 12.8	62 4.9	41 3.2	519 40.9	1270 100.0

附表3 子代初階到子代現階交叉表

		子代現階							列小計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專業經理	非專業經理	專業人員	半專業人員	勞工階級	
子代初階	資產階級	30人	2		3			3	38人 4.2%
	小資產階級	29	175		10	2	1	32	249 27.6
	專業經理	4	1	8	1	1	1		16 1.8
	非專業經理	12	12	3	54	1		14	96 10.7
	專業人員	2	4	7	4	39	3	3	62 6.9
	半專業人員	2	2	3	4	2	18	6	37 4.1
	勞工階級	36	65	3	57	4	5	233	403 44.7
	行小計	115人 12.8%	261 29.0	24 2.7	133 14.8	49 5.4	28 3.1	291 32.3	901 100.0

參考書目

- 王振寰，1989，〈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4):147-174。
- 吳乃德，1997，〈臺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與原因〉。《臺灣社會學研究》1:137-167。
- 柯志明，1993，《臺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徐進鈺，1999，〈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勞動力市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5:11-54。
- 許嘉猷，1981，〈新結構論：社會階層研究的新方向〉。《思與言》19(3):234-249。
- 許嘉猷，1982，〈出身與成就：臺灣地區的實證研究〉。頁265-299，收錄於陳昭南、江玉龍、陳寬政主編，《社會科學整合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許嘉猷，1986，《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臺北：三民書局。
- 許嘉猷，1990a，〈臺灣的階級流動及其與美國的一些比較〉。《中國社會學刊》14:1-30。
- 許嘉猷，1990b，〈美國小資產階級的再興及其意義〉。《美國研究》20(3):1-25。
- 許嘉猷編，1994a，《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 許嘉猷，1994b，〈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臺灣與美國實證研究之比較〉。頁21-72，收錄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

- 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歐美所。
- 許嘉猷，1998，〈社會學門專門領域成就與評估：社會階層化〉。《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前會社會學門分組討論附錄》。頁44-46。
- 許嘉猷，2000，〈臺灣都會地區的階級結構、階級流動與再製〉。頁13-43，收錄於劉兆佳等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孫清山、黃毅志，1995，〈教育、收入與社會資源和階級取得過程之關聯〉。頁151-182，收錄於林松齡主編，《臺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臺中：東海大學。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臺灣社會學刊》19:95-139。
- 孫清山、黃毅志，1997，〈臺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頁57-101，收錄於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臺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臺北：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
-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兼論對技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意涵》。臺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黃毅志，1993，〈臺灣地區教育對職業地位取得影響之變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125-162。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臺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熊瑞梅、黃毅志，1992，〈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中國社會學刊》16:107-138。
- 蔡淑鈴、瞿海源，1992，〈臺灣教育階層化之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1):98-118。

- 蔡瑞明、林大森，2000，〈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以臺灣的教育分流為例〉。收錄於劉兆佳等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薛承泰，1994，〈影響學位取得的家庭因素：中美跨國比較之研究〉。《臺大社會學刊》23:17-252。
- 薛承泰，1996，〈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臺灣社會學刊》20:49-84。
- 謝小苓，1992，〈性別與教育機會—以兩所北市國中為例〉。《國家科學委員會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2):179-201。
- 謝雨生、余淑娟，1990，〈臺灣的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流動〉。《中國社會學刊》14:31-63。
- 謝國雄，1989a，〈黑手變頭家—臺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2):11-54。
- 謝國雄，1989b，〈外包制度—比較歷史的回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29-69。
- 謝國雄，1997，《純勞動：臺灣勞動體制緒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瞿海源，1982，〈勞力市場與出身對成就之影響〉。《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3:133-153。
- 魏惠娟，1998，〈從終生學習的觀點反思我國成人教育政策及未來行動〉。《教育政策論壇》1(2):50-80。
- Agresti, A.,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Y: Wiley.
- Bechhofer, F. and B. Elliott, 1985,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Late Capit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181-207.
- Becker, Gary, 1964, *Human Capital*.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ishop, Y. M. M., S. E. Fienberg, and P. W. Holland, 1975, *Discrete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lau, Peter M. and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Y: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eiger, R., 1981,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78-611.
- Clogg, C. C., 1981, "Latent Structure Models of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836-868.
- Featherman, D. L. and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Y: Academic Press.
- Elster, J.(ed.), 1986, *Karl Marx: A Rea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Y: Harper and Row.
- Goldthorpe, J. 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ut, M., 1983,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Sage.
- Lin, Nan, 1997,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Pp.103-145, in

-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and Fu-Chang Wang. Taipei: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Mare, Robert, 1991, "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15-32.
- Marsden, P. V., 1985, "Latent Structure Models for Relationally Defined Social Cla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1002-1021.
- Marx, K. and F. Engels, 1958, *Se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 Mincer, Jacob,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al, D., 1995, "Industry-Specific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Displaced Worker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653-677.
-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and Saskia Sassen-Koob, 1987, "Making It Underground: Comparative Materi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30-61.
- Raftery, A. E., 1986, "Choosing Modeling for Cross-Classific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145-146.
- Sewell, W. H. and R. M. Hauser, 1975,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Earnings: Achievement in the Early Career*. NY: Academic Press.
- Sheu, Jia-You, 1993, "The Composition and Changes of Taiwan's Petty Bourgeoisie: 1976-1987." Pp.177-200, in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 Class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Michael Hsiao Hsin-Hu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Sobel, M. E., M. Hout and O. D. Duncan, 1985, "Exchange, 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59-372.
- Snipp, C. M., 1985,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Class: Insights from Men's Career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475-492.
- Steinmetz, G. and E. O. Wright, 1989,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973-1018.
- Stier, H and D. B. Grusky, 1990, "An Overlapping Persistence Model of Career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736-756.
- Tam, Tony, 1998, "Getting Ahead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Positional Capital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August.
- Tsai, Shu-Ling, Hill Gates, and Hei-Yuan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243-263.
- Tsay, Rueyming, 1997, "Leaving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Pp.15-55,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and Fu-Chang Wang. Taipei: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stern, Mark and E. O. Wright, 1994, "Th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mong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orway, and Swed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606-629.

Wright, E. O., 1976,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98:3-41.

Wright, E. O.,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Y: Academic Press.

Wright, E. O., 1980,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ology* 9:323-370.

Wright, E. O., 1985,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Wright, E. O., 1990,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E. O., 1999, "Middle Class in Marxist and 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p.51-79, in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M. Hsiao. Taipei: Academia Sinica.

Wright, E. O. and D.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85-102.

Wright, E. O. and L. Perrone,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2-55.

**Crossing Class Boundaries?:
A Discussion of Research on Class Mobility from Workers to Bosses
and Some Comparisons with Western Society**

Jia-You She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Yih-Jyh Hw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Adopting Wright's conceptualization of multiple forms of exploit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class mobility in Taiwan and compares it with that of some Western societies. We categorize the basic class positions in Taiwan and use them to conduct loglinear model analys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ies, and to examine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aiwan.

Using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roject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ollected in 1992, the following major results were found:

- (1)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rocess from the parent's class to the class of the son's first job, the authority layer is the most permeable, ownership is next, and the scarce skills layer is the least permeable.
- (2)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rom parent's class to the class of the son's current job, the scarce skills layer is the least permeable, the authority layer is next, and ownership is the most permeable layer.
- (3) Finally, with regard to the career mobility from the class of the son's first job to the class of the son's current job, the scarce skills layer is still the least permeable, next is the ownership layer, and the authority layer is the most permeable.
- (4) Under the premise that structural barriers exist which hinder class mobility, de-proletarianization and intragenerational career mobility are still possible for some workers. This process takes the form of embourgeoisement-class mobility from workers to bosses (especially small bosses)-and managerialization, but lacks professionalization.

Key Words: Class Mobility, Class Boundary, Class Permeability, Multiple Forms of Class Exploitation Approach, From Workers to Bosses